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12)03-093-(10)

试论跨国社会运动的特点 及其对当代国际格局演变的影响*

叶 江¹ 徐步华²

(1.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 200233 2.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020)

摘 要:冷战之后迅速勃兴的新一轮跨国社会运动,出现了运动范围的全球化、社会诉求的多样性、组织形式的网络化以及运动目标的去革命化等特征,这些都与以往的跨国社会运动形成很大区别。更为重要的是,当代跨国社会运动通过不断地冲击着国家在国际格局中的“垄断”地位,推动非国家行为体走向全球治理的前台,促使国际格局向着多元化的方向不断发展,以及促进国际规范结构的重构而推动着当代国际格局的演变。

关键词:跨国社会运动;国际格局;全球治理

全球化对当代国际体系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影响就是非国家行为体在当代国际格局发展演变中的作用不断提高。虽然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进程中,国家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其地位和作用却发生了变化,在一些国际事务领域中国家的作用有明显的加强,而在另一些领域国家则显然失去了权力。与此同时,尽管国家依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保留着相当程度的重要性,但是,广泛的非国家行为体却越来越多地拥有显著的构建全球政治和经济的能力。更为引人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一轮的跨国社会运动对全球化进程中的当代国际事务产生了直接的重要影响,并且通过促进当代国际体系中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的调整而型塑当代国际格局。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迄今国内国际关系学界对当前跨国社会运动的发展演变及其对当代国际格局影响的研究则几近空白,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此做一些粗浅分析,以期引起学术同道们更进一步的讨论。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前国际格局走向与和谐世界建设研究》(项目批准号 06BGJ004)的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2011-12-26

作者简介:叶江 男(1955-)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兼职教授 博士生导师

徐步华 男(1976-)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社会运动与跨国社会运动

在具体讨论跨国社会运动及其对当代国际格局的影响之前,我们应对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s)和跨国社会运动(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概念的意涵做简要的分析。一般而言,社会运动是以“社会变革”为目标,在一国之内“通过非制度化的方式,有意识的、有组织地引发或阻止大规模社会秩序变革的集体活动”。社会运动是在国内公民社会领域中运作,并且是具有共同利益的人们团结在一起,共同追求社会变革的过程,其力量在于大众动员以影响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所有者。社会运动又是围绕冲突性议题而进行的集体行动,因此它是一种抗争政治,是“社会动员团体与权力所有者进行的持续的抗争性互动”。社会运动的内部组织特征则是一种非正式互动网络,其主体不仅仅是正式组织,还包括尚在形成中的组织,乃至非正式的形形色色的关系网络。“社会运动是形形色色的个人、团体和(或)组织之间非正式互动的网络……是以共同的集体认同为基础并参与到政治的或文化的冲突之中的,形形色色的个人、团体和(或)组织之间非正式互动的网络”。由此可见,社会运动可以界定为:在任何国家的公民社会中,以共同信仰为基础的个人、团体和正式组织,围绕冲突性议题进行动员并展开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的非正式社会活动网络。

与社会运动概念相比,跨国社会运动概念的意涵可能更为复杂一些。对跨国社会运动比较简单的界定可以是:当社会运动围绕着包含社会变革的共同目标,有意识地努力建立跨国合作时,就是形成了跨国社会运动。然而问题在于,在社会运动的议题、对象、动员和组织等各个方面都可以建立跨国合作,那么是不是只要其中有一个因素具有跨国特征,而其他因素都局限于国内,这样的社会运动就是跨国社会运动?诸如聚焦于一国议题的跨国联盟,如当年国际性的反对南非种族隔离运动;一国内部反对跨国目标的社会运动,如1987年德国柏林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会议的运动等,这些是否都可以归为跨国社会运动就颇有争议。为此,西方学术界的跨国社会运动研究者就提出,跨国社会运动应该是指“在至少两个国家拥有支持者的社会动员团体,与除本国之外的至少一个国家中的权力所有者进行持续地抗争性的互动,或者反对一个国际机构或多国经济行为体”。或者是指“一批具有共同目的和团结一致的跨国行动者,它们拥有在两个以上国家发动协调一致的、连续的动员以公开地影响社会变革的能力”。

因此,对跨国社会运动进行界定的一个比较适宜的方式是依据组织结构的标准。当社会运动由紧密相连的、来自两个以上国家的个人、团体和组织构成时,我们就可以称之为跨国社会运动。其中“紧密相连”意味着为协调动员以达成共同目标而持续地相互作用。跨国社会运动与国内社会运动一样,都包括广泛的政治行为体:个人、团体、行业协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其中包括宗教团体),但二者在所动员的行为体和资源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在国际舞台上进行交流、咨询、协调与合作而相互区别开来。这也就是说,当社会运动在国际层面组织起来,并且通过定期的交流时,这些社会运动的活动家能够跨国界地分享技术和战略信息,协调平行举行的活动,发动真正跨国性的集体行动,那么这样的社会运动就是跨国社会运动。要之,跨国社会运动就是以共同目标和团结一致为基础,在两个以上国家发动协调一致和连续动员的抗议活动,从而公开地影响社会变革的跨国行动者(其中包括个人、团体和正式组织)所组成的非正式社会活动网络。这里的跨国行动者包括活跃于国际舞台的国际活动家和普通的参与者、跨国社会运动组织或国际非政府组织、具有跨国特征的国内社会运动组织以及其他自认为属于跨国社会运动之一部分的全球公民社会团体。

毋庸置疑,不论是社会运动还是跨国社会运动都不是当代世界的产物。美国著名社会运动研究者查尔斯·蒂利在其著作《社会运动1768-2004》中指出:“我这里所说的社会运动——即一种独特的实现大众政治的方式和手段——却肇始于18世纪后期的西欧,在19世纪早期的西欧和北美获得

了广泛的承认,在19世纪中期凝结成为综合了诸多要素的稳固的复合体,此后变化趋缓,却从不停顿,最终扩展到了整个西方世界,并被冠以社会运动之名。”虽然,早期社会运动主要在西欧和北美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兴起,比如发生在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织工捣毁机器行动、伦敦平民通过支持威尔克斯争取政治权利的活动,以及美国革命前夕,在13个殖民地由“自由之子社”所推动的抵制进口税和《印花税法》运动等,但是,“一旦社会运动在一种政治环境中安家落户,就能通过模式化运作和彼此的沟通合作,促使社会运动被其他相关的政治环境所接受”。这就意味着,社会运动一旦形成就具有向国际化发展的趋势。美国、英国和法国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就出现了社会运动的国际化,比如废奴运动从18世纪后期开始迅速成为一项国际事业,而到了19世纪诸如妇女解放运动、工人运动、乃至爱尔兰的反英独立运动等都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化发展。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社会运动的国际化早就存在,但是由于自19世纪以降直到20世纪下半叶,国家在现代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地加强,占有明显的强势地位,因此社会运动的跨国发展经常受到国家的限制。国家限制跨国社会运动发展的主要表现在于国家对其领土范围内的资源、行为和人民的控制,以及对跨境流动项目的管制。实际上,今天各国公民在出国旅行时依然在普遍使用的护照制度——由国家来规范国民的护照,并将它与指定的国家挂钩——就是在185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普及的。^①在这样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即使早年曾经非常国际化的国际工人运动,也随国家力量的不断增强而逐渐地从跨国性的社会运动转向以国内为主的社会运动。更有甚者,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模式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以及福利国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建立,也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社会运动的跨国化。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跨国社会运动随着新一轮全球化的发展而发展。二战后形成的全球化不断地侵蚀大多数国家的中心权力,世界市场不断扩展,同时放任资本从一个国家迅速地流向另一个国家并以此牟利。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国家在控制大众传媒、科学知识、国际移民、乃至武器和毒品等的跨境流动方面越来越力不从心,这一方面对国际社会的稳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为社会运动的跨国化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随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的骤然终结,东西方严重对立的两极国际格局寿终正寝。在后冷战时期,全球化更为深入和广泛地发展,非国家行为体——跨国公司、世界金融机构、国际政府间组织(如联合国、欧盟等)、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如世界自然保护同盟、无国界医生组织、欢腾2000^②等)——对全球事务的影响力日增,这一切都极大地推动了全球性的跨国社会运动再度兴起。

二、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发展的特点

自冷战终结直至今日的当代跨国社会运动与滥觞于18世纪后期兴盛于19世纪的跨国社会运动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比如不论是早年的跨国社会运动还是当今的跨国社会运动都是以共同的目标和团结一致为基础,通过在两个以上国家发动抗议活动,从而试图影响社会的变革。但是,今天的跨国社会运动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影响下还具有相当多的不同于早期的跨国社会运动的特点。

首先,后冷战时期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的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已经在全球化的不断推动下遍及整个世界。一般而言,发生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跨国社会运动大都集中在西欧与北美,比如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的废奴主义运动,就是从英国越过大西洋与英吉利海峡,在大西洋两岸的数个国家中展开,直到19世纪这场跨国社会运动发展到顶峰其范围还是在跨大西洋两岸,而19世纪的禁酒运动、妇女运动、工人运动等基本都是在环大西洋国家中展开。当代跨国社会运动的范围已经远远超越西欧和北美,比如针对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对经济全球化有举足轻重的国际经济机构所发起的全球抗议运动,也就是通常所称之为的“反全球化运动”^③就是在全球范

国内展开的。

1999年11月针对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的抗议活动是当代重要的跨国社会运动之一——“反全球化运动”的标志性活动。但是，“反全球化运动”并不局限于西方发达国家，2001年1月在巴西阿雷格里港有超过一万名的跨国社会运动活动者参与了世界社会论坛，商讨反对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对策和行动。在随后的瑞士达沃斯和墨西哥坎昆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出现了一系列的反全球化的抗议活动。不仅针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跨国反全球化社会运动向全球蔓延，而且针对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的跨国环境社会运动、针对妇女争取权利的跨国妇女社会运动、以及争取世界和平的跨国和平社会运动等都不同程度地向全世界的各个角落扩展，以至于世界各地的观察家们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进入21世纪，社会运动正在迅速地全球化。^⑭

其次，当代跨国社会运动的诉求越来越多样化并且诉求对象也日益国际化。当代跨国社会运动诉求的多样化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1、既有宏大社会改革诉求，如反全球化运动的反对新自由主义和争取全球公平正义的诉求，又有相对较小而具体的社会改良诉求，如跨国反大坝运动的为维护生态平衡而呼吁限制建造水坝乃至要求拆除已建水坝的诉求；2、不仅有跨国环境社会运动的保护自然环境、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诉求，还有跨国禁雷社会运动的全面禁止使用地雷的维护人类安全的诉求；3、在传统的跨国工人社会运动、妇女运动的政治经济诉求继续存在的同时，还产生了由跨国和平运动、人权运动、乃至保护土著民运动等提出的新的社会改革诉求。

冷战结束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跨国社会运动的诉求对象国际化主要表现为下述两个方面。第一，随着国际政府间组织，尤其是那些在当代国际体系中具有权威地位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联盟、八国集团等在后冷战时期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当代跨国运动越来越注重在这些国际组织举行高端会议时举行各种形式的抗议或示威的活动，并通过这些公开的跨国活动向这些国际权威机构表达改造国际社会的诉求。比如减除发展中国家债务跨国社会运动就是运用这样的方式向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八国集团等表述自身的诉求；而保护世界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跨国社会运动则在联合国举办高端的环境和气候变化国际会议时，展开各种公开的活动向联合国及其成员国施加自己的影响。第二，当代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跨国公司也已经成为跨国社会运动的诉求目标。近年来诸如壳牌石油公司、耐克公司、雀巢公司、麦当劳公司等著名的跨国公司都遭遇过反多边投资协定跨国社会运动、跨国环境社会运动、保护人权跨国社会运动等通过互联网和面对面进行的直接抗议，并且都在跨国社会运动的压力下，一定程度地调整了自己的经营方式。^⑮

再次，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具有非等级制、非集权制的网络化组织特点，并且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形成了紧密互动的关系。跨国社会运动是在两个以上的国家将众多的个人和团体联系起来，发动协调一致和连续动员的抗议活动，从而公开地影响社会变革的非正式网络。毫无疑问，跨国社会运动与目前已经形成重要影响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并不是同一事物，即“社会运动不等同于组织，更不等同于其中的任何特定组织”。^⑯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却与当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尽管前者的边界不分明，且主要从事于与国家、跨国公司或国际机构之间进行持续的抗争性互动，而后者则组织边界分明且致力于与这些国际体系内的行为体进行常规政治交易。

当代跨国社会运动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紧密相关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当代相当多的（虽然并非全部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具有与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共同的价值理念，以及推进国际社会改革的目标；另一方面，当代国际非政府组织有着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交流和全球治理的丰富经验，已经自我培育起了在全球化环境中推动国际社会改革的组织技巧，^⑰因此，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十分需要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乃至推动。实际上，冷战终结之后，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为处理不同人群之间

的冲突,也为应对全球性问题和寻找解决方案提供了网络或社会基础,从而促进了跨国社会运动的形成和发展。^⑧20世纪晚期以来,生态的、女性的、维护和平的、乃至反全球化的跨国社会运动很多都是由国际非政府组织发起和推动的。

最后,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具有十分明显的社会改良色彩,即它们不像19世纪乃至20世纪前期国际工人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那样充满着革命性。这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当代跨国社会运动既不宣扬和推动暴力革命来改变当代国际体系中主要大国的资产阶级统治,也不提出彻底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革命要求,更没有任何宏大的世界革命理想。与此相反,当代跨国社会运动虽然有时也有比较宏大的社会改革诉求,但是比较普遍的是,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所注重的是以非暴力的方式,针对当代国际体系中具体问题领域里的不公平、不公正、不人道、影响人类安全、威胁世界和平以及阻碍可持续发展等现象,展开跨国动员和抗议,从而推动国际社会的改良。正是因为当代跨国社会运动所强调的是在具体的问题领域如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减除发展中国家债务、保护弱势群体(比如发展中国家的劳工的权益)等方面进行社会改良,所以它们并不要求推翻整个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只是希望通过抗争和运动在现有的体系框架内做具体的改良。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往往“提倡和采取非暴力的直接行动”,实行“非集权化的、非等级制的组织形式”,^⑨它们“将自己视为开放的、参与性的社会运动,具有明确的草根组织形式,并倾向于进行公开的与和平的抗议活动”,其“基本立场是激进的改良主义,它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是对其不加节制地追逐权力或利润所造成的社会不公正的一种反应”^⑩,而并不主张推翻现有的国际体系。

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对其诉求对象不论是国家还是权威的国际政府间组织,或是跨国公司,尽管往往采取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并极尽批评之能事,但是却并不提出革命性的要求。比如反全球化跨国社会运动对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国集团等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并且在这些权威的国际机构举行高层级国际会议时组织各种类型的示威和抗议活动,但是,它们的诉求并不是要消灭这些当代国际体系中重要的国际政府间组织,而是要求这些国际机构能注意改变运作方式,更多地关心在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的群体,促使全球化能更加公平合理地发展。同样,当代反多边投资协定跨国社会运动,保护发展中国家劳工权利跨国社会运动所展开的对跨国公司的抗议活动也并不要推进革命——消灭进行跨国剥削的跨国公司,而是希望通过广泛的抗议促使跨国公司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注意保护发展中国家劳工的利益和全球的生态环境等。

总之,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具有一系列与过去的社会运动不同的新特点,而这一系列新特点对当代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对当代国际格局变化的影响尤为明显。

三、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对国际格局演变的影响

国际政治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家肯尼斯·沃尔兹在其经典名著《国际政治理论》中指出:“系统(system)是由一种结构(structure)和相互作用着的单元(unit)组成的。结构是全系统范围的组件,它使得将系统看作一个整体成为可能。”^⑪沃尔兹所说的“系统”指的就是现实的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而“结构”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国际格局(international structure)。沃尔兹认为:“国际结构,是根据一个时代的基本政治单元来界定的,不论这些单元是城邦国家、帝国还是民族国家。结构产生于国家的共存局面。”^⑫这也就意味着,根据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国家是构成国际格局的唯一单元,“正如经济学家以公司来界定市场一样,我以国家来界定国际政治结构……只要大国是主要的行为主体,国际政治的结构就根据它们来定义”。^⑬

直到今天,沃尔兹对构成国际体系的国际格局(结构)与单元两层次之间关系的论述,以及对国际格局中单元的界定依然在我国国际关系学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比如在讨论当代国际格局的发

展演变时,国内相当部分的学者都比较赞同这样的观点,即:“国际格局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国际关系构成中,在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集合的基础上,以主权国家和国际集团等战略力量角色及其组合形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结构状态和局面。”^{②4}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当代国际体系正在客观上发生广泛、深刻的变化,而其中非常显著的变化就是国际体系单元层次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这就意味着人们在主观上对国际格局演变认识也必然应该随之而发生变化,从而建构起能更为清晰地反映现实国际关系客观规律的新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结构)理论。在相当的程度上,深入地探讨当代跨国社会运动的发展对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客观影响应该是建构这种新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结构)理论的重要一环。

首先,当代跨国社会运动的发展不断地冲击着国家——这一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在国际格局中的“垄断”地位。前文已经谈到国家在全球化环境中对大众传媒、科学知识、国际移民等跨境流动控制的力不从心,给跨国社会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跨国社会运动发展本身却又反过来进一步削弱国家在国际格局中固有的“唯我独尊”的垄断地位。虽然,任何当代跨国社会运动都没有消灭国家从而彻底推翻现存国际体系这样的革命诉求,但是,绝大多数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却为了达到自身改革国际社会的目的,通过各种形式的抗议、示威揭示国家在全球化环境中应对全球性问题能力的下降,并且积极地推动国家特别是大国通过国际机制参与全球治理。

事实上,不论哪种类型的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如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减除发展中国家债务、全面禁止使用地雷等运动)都是通过组织动员跨国行动,发动跨国示威等向当代国际体系中的国家以及由国家组成的非国家行为体——国际政府间组织指出如何应对全球性问题挑战的正确之道,促使国家、国际政府间组织能从全球利益的高度,结合自身的国家利益,以正确的方式处理全球化不断深化环境中的国际关系,从而使得现存的国际体系能继续在由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中保持稳定。比如作为跨国反全球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敦促发达国家减除发展中国家债务的社会运动就是如此行动的。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跨国减债社会运动就不断地向发达国家以及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施加压力,要求发达国家实质性地减免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最终促使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西方发达国家成员国的同意,于1998年宣布从2000年开始减免玻利维亚、莫桑比克、毛里塔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等国的部分债务。此后,西方发达国家还进一步提出减免发展中国家所欠自己的债务。截止2004年4月,世界上28个最贫穷国家获得了430亿美元的债务减免,而这只是发达国家所承诺的为42个国家取消1000亿美元债务中的一部分。^{②5}由此可见,跨国社会运动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代国际体系中对现实国际事务发生重要影响的力量,并且从一个侧面改变了国家尤其是大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独断专行的传统局面。

其次,当代跨国社会运动推动非国家行为体走向全球治理的前台,成为决定国际格局发展演变走向的不可或缺的单元。结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强调构成国际格局(结构)单元层次的单一性,即虽然在现实的国际体系中存在着国家之外的单元,但是只有国家并且只有大国才是建构国际格局的单元,即“现实主义者重视大国,因为这些国家主宰和塑造着国际政治,同时也引发致命的战争”。^{②6}然而,当今国际体系发展演变的客观现实则对现实主义的单元观形成巨大的冲击。在全球化的作用之下,国家之外的非国家行为体,诸如跨国公司、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等都日益明显地成为建构当代国际格局的重要单元,而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则是促使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在当代国际体系中扮演不可或缺角色的催化剂。

国际非政府组织是参与和推动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发展的重要非国家行为体,但是与此同时,跨国社会运动也是推动国际非政府组织成为建构当代国际格局的重要单元的直接推手。虽然国际非

政府组织自身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世界政治中国家垄断一切合法行动的神话,但单个或少数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毕竟势单力薄,而要真正地对国际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成为影响当代国际体系发展方向的重要单元,则还需要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各个议题领域上结成跨越国界的组织网络,通过信息传递、资源共享、共同行动来致力于一定价值和目标的实现。跨国社会运动恰恰就是国际非政府组织网络化、制度化发展的形式,正是跨国社会运动在后冷战时期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行动能力和议题影响力,从而使其获得了在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体系之外提出、传播和塑造诸如人权、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公益性质的实质性价值的巨大能量。^{②7}

如果说国际非政府组织通过参与当代跨国社会运动而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建构当代国际格局的重要单元,那么国际政府间组织和跨国公司(其中尤其是前者)这样的非国家行为体则是作为跨国社会运动的诉求对象而突显出它们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当代跨国社会运动针对国际政府间组织的诉求主要为两个方面:1、推动国际政府间组织在处理全球性问题上起积极的甚至是主导性的作用,比如跨国环境社会运动就不遗余力地通过大规模的国际层面的社会动员,促使联合国在应对全球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上不断地扮演主导性角色;2、要求国际政府间组织针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而做深刻的改革,使之能为全球化环境中的国际社会改良做贡献,比如反全球化的跨国社会运动就通过跨国抗议和示威,要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八国集团等国际政府间组织关注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改变不注重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的态度,纠正无视最不发达国家不断贫困化的政策。跨国社会运动正是通过这样的诉求,推动国际政府间组织更为明显地走向全球治理的前台,成为当代国际体系中建构国际格局的重要非国家行为体。

再次,当代跨国社会运动成为国际体系中联系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纽带,使得两者成为当代国际格局中相互依存的单元,从而促使国际格局向着多元化的方向不断发展。从后冷战时期跨国社会运动发展的轨迹和特点可见,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交集随着跨国社会运动的全球性扩展而日益紧密。一方面,跨国社会运动在国际社会的不同领域催生了阐释新的政治行动主张的新思想,促使新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形成,^{②8}并且推动新老国际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实现这些新思想的跨国政治行动,从而致使国家及国际政府间组织不同程度地接受这些新思想并据此而参与全球治理。比如禁止使用地雷跨国社会运动首先提出了禁止使用、储存、生产、转让并销毁杀伤人员地雷的新思想,并且在积极参与该跨国社会运动的非政府组织的推动下,促使全世界138个国家签署《禁止使用、储存、生产、转让并销毁杀伤人员地雷公约》,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国家通过跨国社会运动而形成密切的互动由此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当代跨国社会运动通过向国家、跨国公司、国际政府间组织提出实现自身理想的诉求,如保护发展中国家工人的人权、保护全球环境、争取妇女权利、保障食品安全、关注以人的安全为主体的非传统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等,从而促使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相互协调、共同应对由全球化的深化所带来的全球性问题。诸如针对跨国公司的反对多边投资协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工人人权、保护环境等跨国运动,实际上都在发动针对跨国公司的跨国抗议同时,通过全球性的倡议网络要求国家(不论是资本输出国还是东道国)不仅要加强对跨国公司的监管,而且更重要的是应该通过与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跨国公司本身的积极协调,促使跨国公司能主动地参与环境全球治理、认真地保障发展中国家劳工的权利等。

最后,跨国社会运动通过重构国际规范结构而推动着国际格局的演变。

包括跨国社会运动在内的全球公民社会的治理功能是“对国家体系治理功能的补充而非取代”,^{②9}跨国社会运动对全球治理所产生的影响和成果最终要通过国家来贯彻和执行。因此,跨国社会运动无法从根本上撼动主权国家的地位和国际政治权力结构,然而,跨国社会运动的一个重要作

用在于“创造、强化、补充和监督国际规范”^③,通过改变国际规范结构进而促进了国际格局的发展和演变。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国际结构从根本上是由世界政治结构所支配的。由于不存在正式的世界政府,现实主义认为世界政治结构的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并由此无政府结构推导出对国家行为的预期。英国学派则认为世界政治结构是某种形式的“国际社会”,国际社会中的国家认为自身受到一套共同的规则和规范的约束。^④按照这种观点,无政府状态或单个大国的霸权就被与之相平行的共同规则和规范的结构所冲淡了。约翰·鲁杰曾提出一种方法思考这种国际结构,即把它视为一个由特定的权力结构与特定的“社会目的”(social purpose)结合而成的结构。^⑤亚历山大·温特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他把这一“社会目的”结构视为国际体系的“观念分配”(distribution of ideas)。^⑥因而,国际社会存在着彼此独立发生的两种机制变革的潜在根源,即权力转移(例如霸权的衰落)或规范变革。^⑦换言之,国际规范和话语与权力一样都是国际结构的一个共同决定因素,而且国际规范和话语也并非总是来源于权力或由权力决定。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规范被定义为“对具有特定认同的行为体的适当行为所持有的共同预期”。^⑧国际规范大多满足了国家对协调和稳定的预期的需求。尽管国际规范往往是国家通力合作在国际组织框架内制定的,然而,跨国社会运动等非政府行为体也是“新规范的重要发起者和促进者”^⑨,在围绕特定的规范性需求发起的运动中,关键的个人和跨国社会运动也扮演着“跨国道德事业家”(transnational moral entrepreneurs)^⑩的角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凯瑟琳·辛金克(Kathryn Sikkink)指出,国际减债运动、国际禁雷运动以及国际大坝运动等跨国社会运动都“有助于塑造一个新规范或修正一个既有的规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球规范结构”,而这些话语和规范又“塑造了人们思考和理解世界的方式”。^⑪她进一步指出,由于我们谈论的“世界政治结构是特定的权力结构和目的结构的熔合体”,也因为跨国社会运动等非国家行为体对新规范和话语的创造至关重要,因此我们认为跨国社会运动参与到“重构世界政治”的过程之中。跨国社会运动“通过改变全球治理的规范结构而促进了世界政治的重构”。^⑫

总之,当代跨国社会运动的发展既导致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化环境中的地位越发重要,也促使国家这一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日益需要与非国家行为体相互协调才能正确地处理国际事务,更推动全球治理在当代国际体系中不同行为体的积极参与和合作中向前发展。由此可见,当代跨国社会运动致使国际政治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国际格局观显得过时,因为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发展本身更为清晰地揭示出构成当代国际格局的单元已远非国家一家可言,虽然国家依然是当代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正是在当代跨国社会运动的推动下,非国家行为体——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 etc 更为明显地成为当代国际体系单元层次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单元,所以用多元的视角考察当代国际格局的发展演变就因此而成为研究分析当代国际体系大变革的不二法门。这或许是何任何当代跨国社会运动本身并没有的诉求,但是,却又是值得研究当代跨国社会运动和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国际关系学者们重点关注的大问题。

注释:

Richard A. Higgott, Geoffrey R. D. Underhill and Andreas Bieler, Introduction: Globalisation and Non-State Actors, in Richard A. Higgott, Geoffrey R. D. Underhill and Andreas Bieler (eds.), *Non-State Actors and Authority in the Global System*, London: Routledge, 2000, p. 1.

笔者这里使用的是“跨国社会运动”这一术语,实际上有些学者也称之为“全球社会运动”,而比较多的学者尤其是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则采用“跨国社会运动”的概念。

John Wilso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Movement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 8. 约翰·威尔逊进一步将社会运动划分为四种类型：变革型(transformative)、改良型(reformative)、救赎型(redemptive)和另择型(alternative)。变革型社会运动通过暴力方式或参与某种灾难性的变革，寻求改变整个社会结构，既包括左派运动，也包括原教旨主义运动。改良型社会运动：目的在于部分变革以补偿当前的不公与不平等，一般为单议题运动，如反核运动、女权运动等。救赎型运动：涉及工人的彻底改变，使个人问题从社会背景中分离出来，并成为人性改变和个性改善的问题。另择运动：并不一定要变革或改革体系，而是寻求发展切实可行的、可持续的另一种生活方式，以保护能源和稀缺资源，并更加关注精神价值层面。See pp. 14–29.

Sidney Tarrow, *Transnational Politics: Contention and Institutio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4 (2001), p. 11.

Mario Diani, The Concept of Social Movement, *Sociological Review* 40 (1992), p. 8, p. 13.

Sidney Tarrow, *Transnational Politics: Contention and Institutio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4 (2001), p. 11.

Sanjeev Khagram, James V. Riker and Kathryn Sikkink, From Santiago to Seattle: Transnational Advocacy Groups Restructuring World Politics, in Sanjeev Khagram, James V. Riker and Kathryn Sikkink, (eds.) *Restructuring World Politics: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Networks, and Norm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p. 8.

Jackie Smith, Ron Pagnucco and Charles Chatfield, Social Movements and World Politic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Jackie Smith, Charles Chatfield and Ron Pagnucco (eds.),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and Global Politics*,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59–60.

[美]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胡位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

[美]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胡位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⑪ John Topey, *The Invention of the Passport: Surveillance, Citizenship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93–117.

⑫ “欢腾2000”的英文原名为：“Jubilee 2000”，国内学界也有翻译为“福音2000”或“大赦2000”。该非政府组织发源于英国，后成为一跨国非政府组织，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所追求目标为促使富国减少或免除穷国的债务。进入21世纪后分化为数个不同的非政府组织。

⑬ 其实“反全球化运动”是媒体对其的贬义称谓，也有学者称之为“反资本主义运动”，但现在日益被称为“全球正义运动”。参见 Mary Kaldor Helmut Anheier, and Marlies Glasius, Global Civil Society in an Era of Regressive Globalisation, in Mary Kaldor Helmut Anheier, and Marlies Glasius (eds.), *Global Civil Society 200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4. 不过，鉴于“反全球化运动”这个称谓已经流传开，所以，本文还是沿用这个“不太恰当的”称谓。

⑭ [美]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胡位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9页。

⑮ 20世纪90年代，壳牌石油公司试图将一个废弃的海上钻井平台沉在英国北海，反对多边投资协定(MAI)的公民运动、环保跨国社会运动人士等发起一场公民抗议行动，迫使壳牌石油公司最后将钻井平台拖上岸销毁。反对雀巢公司的跨国社会运动则迫使该公司修正了向贫穷国家推销人工哺乳奶粉的战略，承认并实施世界卫生组织有关经销母乳替代品的国际法规。抗议生产体育用品的厂家——特别是耐克公司的承包商——不尊重人权的跨国社会运动最终导致相关的跨国公司接受这样的观点：一家大企业对其承包商的工资待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即使二者除了商业关系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关系。

⑯ Mario Diani, The Concept of Social Movement, *Sociological Review* 40 (1992), pp. 13–14.

⑰ 参见叶江：《试论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途径》，《国际观察》2008年第4期，第16–24页。

⑱ Louis Kriesberg, Social Movements and Global Transformation, in Jackie Smith, Charles Chatfield and Ron Pagnucco (eds.),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and Global Politics*,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2–13.

⑲ Neil Stammers,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Challenge to Power, in Martin Shaw (ed.), *Politics and Globalisation: Knowledge, Ethics and Agency*, London: Routledge, 1999, p. 84.

⑳ Dieter Rucht, Critique of Capitalism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 Old Wine in New Bottles? in Ingo K. Richter, Sabine Berking and Ralf Müller-Schmid (eds.), *Building a 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 Global Issues and Global Actor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p. 116–117.

㉑ [美]肯尼斯·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3页。

㉒ [美]肯尼斯·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07–108页。

㉓ [美]肯尼斯·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12页。

㉔ 梁守德主编：《新世纪的国际政治》，学习出版社，2001年，第104–108页。

㉕ Ann Pettifor, The Jubilee 2000 Campaign: A Brief Overview, in Chris Jochnick and Fraser A. Preston (eds.), *Sovereign Debt at*

the Crossroads: Challenges and Proposals for Resolving the Third World Debt Cris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98.

②⑥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页。

②⑦ 刘宏松：《跨国社会运动及其政策议题的有效性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0期，第19页。

②⑧ Peter Willetts, From Stockholm to Rio and beyond: The impact of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on the United Nations consultative arrangements for NGO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2 (1996), p. 62.

②⑨ Paul Wapner, Governance in Global Civil Society, in Oran R. Young (ed.), *Global Governance: Drawing Insights from the Environmental Experien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7, p. 67.

③⑩ Sanjeev Khagram, James V. Riker and Kathryn Sikkink, From Santiago to Seattle: Transnational Advocacy Groups Restructuring World Politics, in Sanjeev Khagram, James V. Riker and Kathryn Sikkink (eds.), *Restructuring World Politics: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Networks, and Norm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p. 4.

③⑪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3.

③⑫ John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International Regimes (Spring, 1982), p. 385.

③⑬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页。

③⑭ John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International Regimes (Spring, 1982), p. 388.

③⑮ Ronald L. Jepperson, Alexander Wendt and Peter J. Katzenstein, Norms,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National Security,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54.

③⑯ Kathryn Sikkink, Restructuring World Politics: The Limits and Asymmetries of Soft Power, in Sanjeev Khagram, James V. Riker and Kathryn Sikkink, (eds.) *Restructuring World Politics: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Networks, and Norm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p. 301.

③⑰ Ethan A. Nadelmann, Global Prohibition Regimes: The Evolution of Norm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4, No. 4 (Autumn, 1990), p. 482.

③⑱ Kathryn Sikkink, Restructuring World Politics: The Limits and Asymmetries of Soft Power, in Sanjeev Khagram, James V. Riker and Kathryn Sikkink, (eds.) *Restructuring World Politics: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Networks, and Norm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p. 306.

③⑲ Kathryn Sikkink, Restructuring World Politics: The Limits and Asymmetries of Soft Power, in Sanjeev Khagram, James V. Riker and Kathryn Sikkink, (eds.) *Restructuring World Politics: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Networks, and Norm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p. 302.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and Its Impacts 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Ye Jiang / Xu Buhua

Abstract: A new wave of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has been emerging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Contemporary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are characterized by globalized scope of activities, diversified social appeals, networked organizing forms and de-revolutionized objectives, which significantly differed from their predecessors during 18th and 19th century. Even more importantly, contemporary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have been contributing to erode the predominance of sovereign st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promoting the non-state actors into the foreground of global governance, stimul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with pluralistic actors and facilitat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norms, thus consequently influenc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system.

Key Words: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Global Governance

(责任编辑 方卿)